【書文評介】

作者：河上麻由子

書名：《古代アジア世界の対外交渉と仏教》

東京：山川出版社，2011年11月10日，312頁。

ISBN：978-4-634-52347-0

李志鴻 *

目次

序論
第一部　遣隋使と仏教
　第一章　南北朝～隋代における仏教と対中国交渉
　　はじめに
　　1. 東晋・南朝への仏教的朝貢
　　2. 北朝への仏教的朝貢
　　3. 隋への仏教的朝貢
　　4. 南北朝～隋代における仏教と対外交渉
　　おわりに
　第二章　中国南朝の対外関係において仏教が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
　　―― 南海諸国の上表文の検討を中心に
　　はじめ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天竺と師子国の例について
2. 上表文一致の背景
3. 仏教色の濃い上表文をもたらした仏教的朝貢の結果
おわりに
第三章　隋代仏教の系譜 ― 菩薩戒を中心として
はじめに
1. 梁の武帝の受戒
2. 陳・北朝の皇帝の受戒
3. 後梁帝室と隋
4. 隋の皇帝の受戒
おわりに
第四章　遣隋使と仏教
はじめに
1.『隋書』倭国伝の検討
2. 仏教色の濃い上表文について
3. 仏教伝来
4. 梁の武帝と隋の文帝
おわりに
第二部　唐の皇帝と天皇の受菩薩戒
第一章　唐の皇帝の受菩薩戒 ― 第一期を中心に
はじめに
1. 太宗の受戒
2. 承乾の受戒
おわりに
第二章　唐の皇帝の受菩薩戒 ― 第二期を中心に
はじめに
1. 武后の受戒
2. 中宗の受戒
3. 睿宗の受戒
おわりに
第三章　唐の皇帝の受菩薩戒 ― 第三期を中心に
はじめに
1. 代宗の受戒と受灌頂
2. 徳宗の受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おわりに
第四章　唐代における仏教と対中国交渉
はじめに
1. 唐代の仏教色を強調する対中国交渉
2. 唐の対外政策と仏教色を強調した対中国交渉
おわりに
第五章　聖武・孝謙・称徳朝における仏教の政治的意義
── 鑑真の招請と天皇への授戒からみた
はじめに
1. 鑑真の招請
2. 天皇等の受戒
3. 受戒の先例
おわりに
結論

本書作者河上麻由子，主要研究古代東亞世界的佛教文化交流，特別聚焦在「佛教朝貢」的探討，該議題成為近年來學界探討古代東亞世界跨國佛教文化交流的熱門議題。

河上先生在 2002 年畢業於北海道大學文學部人文科學科，2008 年在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府博士後期課程單位取得退學後，獲得九州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1]是日本學界相當受到矚目的年輕學者。

本書是近年來日本學界在古代東亞世界中的佛教文化交流的議題上，非常重要的一本專著，在日本學術界廣泛受到引用和討論。除了古代東亞世界的佛教交流外，河上先生也關注古代東亞世界中的佛教和中國、日本王權之間彼此的互動和影響。簡要地說，河上先生的研究特色有以下兩點：第一，將佛教放置在古代東亞世界的交流進行詮釋和理解。第二，主張佛教和古代國家的政治運作相當密切，探討中國王權、日本王權和佛教之間的互動和聯繫。本書是河上先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同時也是日本學界最新的觀點和學術成果，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1] 本文於 2012 年完稿，河上麻由子於 2013 年取得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研究院人文科學系人文社會學領域助教一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東亞世界的佛教交流，第二部分討論唐代的皇帝與日本天皇受菩薩戒。在這兩大部分外，序論置於全書之首，有提綱挈領之效；書末是結論，總結全書各章主旨和核心觀點。以下，針對本書略作陳述和介紹。

序論是本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清晰地點出全書的問題意識、學術觀點。河上先生強調她受到石母田正先生研究的啓發，重視以下三大視角：一、東亞世界對外交涉中的佛教史。二、以統治思想來掌握、理解佛教。三、放在天皇制的問題下來思考（頁 3-4）。另外，河上先生也受到上川通夫先生看法的影響，認為佛教擁有國際性質，並且佛教和古代東亞世界的政治結構密不可分，主張日本古代的佛教歷史應該放置在對外政治和朝鮮半島的政治演變中思索和掌握。本書深深受到上述兩位先生觀點的啟發和影響，特別重視古代東亞世界跨國的對外交流與佛教之間的關係，並且將佛教放置在東亞政治史來進行討論和詮釋。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先生除了承繼日本東亞史的學術觀點外，更強調佛教並不只是在東亞世界中傳佈和交流，她主張要以中國為中心來看待中國和其周邊國家的佛教交流和互動（頁 4-5）。簡單地說，河上先生嘗試從東亞世界的國際交流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和詮釋日本的古代佛教史（頁 10）。在佛教與古代國際交流史的研究方面，河上先生根據中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文字史料，探討中國天子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文書中的「佛教朝貢」，構成了本書的第一部分；在佛教與政治史的研究上，則聚焦在唐代王權、日本王權受菩薩戒所可能衍生的政治意涵和意義，以上則構成了本書的第二部分。透過序論，我們可以正確地、清楚地掌握河上先生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觀點。

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在探討東亞的佛教與對外交涉議題，由四章所構成。第一章探討中國南北朝至隋代時期的佛教和中國對外的交流，在該章中，作者提出「佛教朝貢」的概念，所謂的「佛教朝貢」可根據對外交涉的文書中的修辭、內容，定義分為三大類：稱讚中國天子為佛教聖王為主的「崇拜型」、進獻給中國天子佛教文物（佛經、佛像等）的「貢獻型」、請求中國天子贈送佛教相關經疏、佛像的「請求型」（頁 18）。作者發現，中國在南朝時期，佛教朝貢相當興盛，這可能和中國南方新王朝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有關。另外，在中國北朝到隋代，仍舊可以發現若干佛教朝貢的歷史記錄，但是數量上不如南朝的記載。最後，作者推測隋代的佛教在對外交涉上，也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受到南朝崇拜型的佛教朝貢影響（頁 53）。

在第二章，作者聚焦在中國南朝的佛教朝貢的探討，以南海諸國的上表文為核心討論。透過分析南海諸國和中國交流的上表文，作者認為南海國家製作這些上表文的目的，可能有利於這些國家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以此來維持和發展雙邊的貿易，並且獲得中國的回賜品。另外，上表文的製作亦有可能是扶南的僧人所為，尤其南海商人與扶南地區的僧人關係可能相當密切。最後，作者強調中國國內的崇佛政策，必須注意到周邊國家的崇佛政策的影響，以及佛教在國際關係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三章，聚焦在中國南北朝至隋代的皇帝受菩薩戒的討論。在整理、爬梳梁朝、陳朝、北朝和隋代天子受菩薩戒的歷史紀錄後，作者認為梁武帝受菩薩戒的做法可能影響到南北朝至隋代幾位君王接受菩薩戒。作者認為隋文帝、隋煬帝受菩薩戒，也可能是受到梁武帝的作法的影響，隋代王權可能出於當時流行皇帝受菩薩戒、嚮往梁朝的文化、試圖統治南方等等因素，選擇受菩薩戒。

第四章是日本學界的熱門議題，探討遣隋使與佛教。本章透過分析日本和中國的交涉文書，認為日本致書給隋國的文字可能援用《金光明經》的「天子」定義，將日本天皇定義為「正法治世」的國王。另外，作者透過南朝外交國書的佛教朝貢的研究，認為倭國遣使入隋也可能是想藉由佛教朝貢的「崇拜型」來取得隋文帝的歡心（頁 132-133）。簡要地說，作者認為古代倭國試圖透過佛教與古代東亞世界中以中國為中心的隋國建立關係，因此在日、中的外交文書上，使用佛教朝貢的文字。

第二部分主要討論中國唐代皇帝受菩薩戒的歷史現象，構成了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是東亞世界中唐帝國的佛教對外交涉的討論，最後，第五章探討日本八世紀天皇受菩薩戒的歷史意義。

第一章聚焦在唐太宗到唐高宗時期皇帝受菩薩戒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唐代皇帝接受菩薩戒，除了祈求個人的功德外，也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來探討該課題（頁 150）。他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作者認為唐太宗的菩薩戒可能是自誓受戒，換言之，是皇帝本人自己替自己受菩薩戒，並非由僧人替他受戒。第二，皇帝受菩薩戒成為菩薩天子或菩薩皇帝，在當時被視為佛教聖王，是實現理想政治的君王，在佛教世界中擁有非常特殊和崇高的地位。第三，佛教僧團勢力期盼出現一位護持佛教的聖王，他們可能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這樣的目的，積極向唐代皇室接近，並且替王者傳授菩薩戒。本章透過上述三點，探討唐太宗至唐高宗前皇室受菩薩戒的歷史現象，他認為在該時期是採皇帝、皇太子皆受菩薩戒的模式，但是在李承乾被廢除太子之位後，這樣的模式停止，故定義為第一期。

第二章則探討武后、唐中宗、唐睿宗受菩薩戒所可能蘊含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武則天受菩薩戒，可能受到唐太宗時期佛教界提倡的理想聖王觀念有關，也就是皇帝皆受菩薩戒可以實現理想的政治，他認為武后朝的君臣可能繼承了唐代前期的認識。在唐中宗的探討上，作者強調中宗受菩薩戒，除了自身的佛教信仰外，也透過菩薩戒的取得，強調繼承、延續武后政權的意識形態，並且透過菩薩戒皇帝的身分，來爭取、掌握人心。最後，在睿宗的討論上，則強調睿宗施行寺院整理令引來了唐代佛教界的反感，睿宗透過南山律宗僧人文綱接受菩薩戒，以強調自身是崇佛的君王，並且以此來迴避當時佛教界的對立。上述這段期間，作者強調唐代帝位傳承的不穩定，此時皇帝受菩薩戒可能擁有政治用意，作者定義為第二期。

第三章則探討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接受密教灌頂與菩薩戒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在唐玄宗至肅宗時期，他們的佛教信仰比較淡，較期待佛教在政治上的效果（頁 192）。首先，作者探討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皆受唐代密教僧人不空的灌頂，作者舉出上述君王接受的灌頂主要是轉輪王灌頂，以此取得佛教界最高君王的地位，加強王權的權威，以安定政權不穩定的唐王朝（頁 192-194）。第二，唐代宗時期，除了接受不空的灌頂外，也接受菩薩戒，作者強調該時期佛教發展和當時的政治鬥爭關係密切，唐代宗接受菩薩戒增強自身的影響力，透過尊崇佛教來對抗當時反對的政治勢力（頁 196）。最後，在唐德宗時期，由即位起初反佛到接受佛教菩薩戒，作者推測可能是出於帝王試圖掌握人心有關。

綜合上述三章，作者認為唐代皇帝接受菩薩戒，除了期許生病康復的私人祈願目的之外，有以下三個核心目的：第一，宣示皇帝本人就是救濟眾生的菩薩，以爭取、掌握人心。第二，取得崇佛人士、佛教界的支持，並且以菩薩戒皇帝的身分來聯繫、溝通、維持彼此的關係。第三，皇位繼承的正當性，尤其強調皇帝傳位後，後任君王繼承、延續上任君王的統治意識形態。綜而言之，作者強調唐代的王法和佛法之間彼此不是單純的對立關係，唐代王者接受菩薩戒，是建構王法與佛法協調關係的重要關鍵，值得考慮和注意（頁 204）。

臺灣大專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四章探討唐代的佛教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交流。透過唐代的史料，作者認為唐代延續中國南北朝至隋代的佛教朝貢，許多文字史料上皆使用佛教的修辭來稱許中國的天子。特別的是，該時期出現新的佛教朝貢的模式，作者定義為「僧侶使節型」，也就是唐代僧人亦扮演中國對外交流的外交使節（頁 240-242）。在唐代，佛教在中國對外的國際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唐代的佛教與對外交流也可以視為中國南北朝至隋代時期「佛教朝貢」的延續。

第五章是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議題，探討聖武、孝謙、稱德朝時期佛教的政治意義，以日本天皇招請唐代律宗僧人鑑真替其受戒為核心討論。作者強調，日本天皇聘請鑑真來到日本，除了日本天皇想要透過戒律來整頓日本國內佛教的目的外，也是日本模仿唐國為崇佛國的表現，推測古代日本王者透過佛教來和中國唐政權進行對外交涉，以建立彼此良好的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王者受菩薩戒與政權繼承的模式也可能影響到孝謙、稱德朝，推測孝謙天皇受菩薩戒，可能受到武則天以佛教作為政權即位正當性的影響，孝謙天皇可能是基於模仿武則天的作法，因此選擇聘請鑑真作為他的菩薩戒師（頁 274-275）。

全書的最後是本書的結論，總結本書兩大部分及各章的主旨，非常值得一讀。簡要地說，可以分為以下三點陳述：第一，作者再次強調佛教放置在古代東亞世界的歷史意義和詮釋，不論是中古中國還是古代日本時期的佛教，除了國別史的佛教研究視野外，應該重視佛教在東亞國際之間交流、互動的歷史現象。第二，佛教不只是宗教或信仰而已，應放置在古代東亞政治結構中進行理解和詮釋；換言之，佛教也擁有政治意義和功能的面向，這部分不應該被低估或忽略。實際上，除了儒教之外，佛教可能也在古代東亞世界中扮演另外一種政治和外交學說，被中、日王者所運用。第三，佛教和東亞各國內部政治發展的關係可能相當密切，尤其是中國南北朝至隋唐和古代的日本，王者可能透過佛教建構政權統治的合理性，並與國內佛教勢力締結彼此的關係，尤其王者透過接受菩薩戒，以此身分作為佛教聖王，並且來和國內的崇佛人士、佛教勢力取得聯繫和妥協。上述三點，是河上先生的卓見，也是本書的核心觀點。

本書是河上先生的第一本專著，也是近年來日本學界探討古代東亞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佛教與王權互動的最新研究，非常值得重視。事實上，古代東亞世界的研究自西嶋定生的提倡後，學界多數的研究多聚焦在冊封體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皇帝制度和儒教相關的研究上，佛教雖然是西嶋先生所定義的東亞世界中的四大要素，然而，以古代東亞世界的視角來探討佛教的研究至今仍舊相當稀少，這正是河上先生研究的可貴之處，填補了國際學界在此議題研究的空白，對於學術界在此議題的研究上非常有貢獻。

相當可貴的是，河上先生運用新視角賦予傳統文獻文字史料上新的詮釋。我們可以發現本書使用的史料，並非是新出的史料，相反地，多數是出現在中國正史和官方文書的記載。此外，河上先生運用佛教的經、疏，放置在中國對外交流和古代東亞的結構中進行探討，這樣的做法，相當新穎且擁有創意，得出的結論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本書在議題的選定、內容的陳述、文章的結構等方面都相當出色，然而，在章節的安排上比較可惜的是以下兩點：第一，本書的第一部分是遣隋使與佛教，探討古代東亞世界的佛教與對外交流，但在第三章安排討論隋代佛教的系譜——以菩薩戒為核心討論，和第一部分主旨無關，而與第二部分皇帝受菩薩戒的政治意義的討論關係比較密切。第二，第二部分的主旨是討論唐代皇帝與日本天皇受菩薩戒的意義，然而，在第四章探討唐代的佛教與對外交流，也和該部分主旨無關，反而和第一部分關係比較明確。

以下，針對全書的學說，在此提出幾項或可商榷之處。首先，是關於「佛教朝貢」一詞，「佛教朝貢」是河上先生非常重要的觀點，並且賦予三種類型的定義。然而，佛教在國際之間的交流，是否可以以「朝貢」一詞來定義？在中國南北朝的佛教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君王和周邊王者的往來，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君臣關係，位於印度、東南亞地區的王者也沒有和中國天子締結君臣關係和取得將軍號，這樣的情況異於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和日本的倭國，上述諸國的國王皆取得中國天子的冊封和將軍號。因此，在古代東北亞的國際交流互動上，確實是佛教和儒教冊封體制並行的情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印度、東南亞的王權和中國締結關係如同東北亞的情況。筆者以為，在佛教知識中，世界上是諸國並立的情況，國王（國主）是佛教認知的世界上政治的最高統治者，護持佛法的國王被視為正法國王或者轉輪聖王，會對外推動佛教的傳佈。因此，東南亞地區的王者向中國南朝天子的佛教交流，使用「朝貢」的觀念並非完全妥當。若以「佛教朝貢」的觀點來論述，很容易讓人以為佛教與中國天子對外的冊封關係疊合在一起。然而，佛教作為中國的外來文化，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佛教僧團的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性仍舊很強，尤其在南朝更是如此。因此，佛教在中國的對外交流上，是否有可能是獨立於中國的天子冊封體制之外，成為中國王者和周邊國家互動的另外一種模式？換言之，中國在面對域外政權時，由於印度、東南亞的王權信仰佛教，中國南朝的王權也信仰佛教後，兩地區的王權是基於佛教知識來彼此交流，因此，佛教只是在王權彼此之間跨國交流，並不構成朝貢關係。

另外，在唐代皇帝受菩薩戒的史料討論上，可能有商榷之處。作者在第二部分第二章的陳述中，認為唐中宗曾經受過五次的菩薩戒，對此筆者感到疑惑。在頁 174-180 中，作者曾舉出五段唐中宗受菩薩戒的史料來證明這樣的說法，然而，筆者發現，除了在 174 頁的史料中明確提及唐中宗受菩薩戒之外，其他四條史料並沒有書寫皇帝受菩薩戒，反而多是僧人被請為「戒師」、「菩薩戒師」、「受戒師」的記載。作者將僧人被皇帝請為「戒師」的記載，視為皇帝本人受了五次菩薩戒，筆者持不同的觀點，認為比較大的可能性是皇帝邀請某些高僧替國內的僧人甚或俗人受戒，我們知道，唐代王權緊密管控著佛教僧團的發展，尤其在僧人數量上有非常嚴格的管制。民眾要成為僧人，必須受戒；僧人受了僧戒後，可能再受菩薩戒，屆時君王聘請國內的高僧替僧眾授菩薩戒，使得僧人取得出家菩薩僧的身分。簡要地說，筆者以為唐代皇帝聘請高僧擔任菩薩戒師，不意味著君王要再次接受菩薩戒，受戒的對象可能是國內需要接受菩薩戒的僧眾或者俗人。

本書是古代東亞世界和佛教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專著，日本學者長期耕耘佛教史的研究，國際學界舉目共睹。日本學界一直擁有良好的佛教歷史學術研究的傳統，不只將佛教單單視為宗教、信仰或哲學而已，更重視將佛教放置在歷史的時空中進行詮釋和討論；河上先生繼承了日本學術研究的傳統，值得稱許。另外，日本學界在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上，一直相當重視古代日本和朝鮮半島、中國的交流，並且認為這影響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形成和確立；其中，佛教在日本古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一直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焦點之一。河上先生除了繼承日本學界研究佛教史的傳統外，也承繼日本古代史的學術觀點，並且更放大到中國對周邊域外的交流，這樣的視角已經超越「東亞世界」，而是採取更大的區域範圍來探討佛教的跨國交流現象。簡單地說，河上先生關心的議題不只是佛教史、日本史、東亞史，而是有機地將佛教歷史、古代日本史、中國中古史放置在東亞世界中進行詮釋和討論，這樣的視角、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